

近代史研究

2

1980

K250.7
2
1980/202

一九八〇年第二期

目 录 (总第4期)

忆三年游击战争·····	陈 毅 (1)
朱德、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	(20)
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·····	刘大年 (25)
关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·····	丁守和 方孔木 (38)
关于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及其转化问题··	宋士堂 李德茂 (68)
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·····	张作耀 (98)
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斗争·····	李义彬 (116)
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	
——关于民生主义的研究·····	张 磊 (139)
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·····	汪 熙 (171)
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几个问题(续)·····	林金枝 (217)
魏源向西方学习问题的探讨	
——兼与侯外庐同志商榷·····	吕良海 (239)
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概述	
·····	马庆忠 林飞鸾 黄永祥 (256)
关于孙中山与越飞会谈时间的探讨·····	潘 荣 刘蜀永 (300)
从一八六〇年的北援问题看曾国藩集团·····	朱东安 (307)
宁调元生年考·····	杨光辉 (316)



A 609899

忆三年游击战争

(一九五九年二月)

陈 毅

(一)

从1934年9、10月间红军主力长征，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在这为时约有三年的期间，留在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和苏区人民一道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斗争。这段斗争，通常叫做三年游击战争。

三年游击战争是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的。

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战争，由于当时的教条主义、“左”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经验，机械搬运教条，拒绝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，而遭致了惨痛的失败，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。这个退出，是逃跑主义的，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；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，更是没有准备。当时，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（项英同志负责），和中央政府的办事处（我任主任），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，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组织上都没有布置。一时，苏区处于紊乱状态。

这时，在苏区军民面前，摆开了一个新的形势：过去，中央苏区是个大块根据地，堂堂之府，正正之区，和反动统治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对立。这种战争的对峙局面持续了七年，红军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，革命由低潮日益转入高潮。而今，这块辛勤缔造的苏区在教条主义者手里被断送了，苏区赖以生存的数万主力红军离家远征了，敌人大军压境，整个苏区被一片乌云笼罩着，一场

大的风暴随时可以袭来。

在这样的情势下，苏区的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？

其实，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。敌人即将进入苏区，革命又落于低潮，苏区失败已成定局。失败就是失败，应该承认这个失败。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。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，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。应当冷静地面对现实，认真地组织这次退却，迅速地，坚决地适应形势，抛弃旧有的一套，实行彻底的转变。在政治上，要准备迎接大风暴。进行艰苦的长期的敌后斗争；在军事上，要坚决分散，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；在组织上，要改变我们的领导方式、工作方法。从正规战到游击战，从集中到分散，从统治到被统治，从公开活动到秘密隐藏，这样转变过来，退却下来，保存自己的力量，长期坚持，给形势以若干影响，准备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。

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。实行这个转变是艰苦的，但是必须的。只有彻底实行了这一转变，才能渡过这个风暴，转入胜利；不能实行这个转变，就要失败。

但是，对于面前的严重局势和转变的必要性，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。“左”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仍然“阴魂不散”、“余孽犹存”，影响着一些同志的行动，继续葬送着中央苏区。

他们不能清醒地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，不敢承认失败，而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转移之后的打胜仗上。他们认为主力一出动，在湘桂边连打几个大胜仗，敌人就会撤走，中央苏区就会恢复，轰轰烈烈的局面又会到来。当然，如果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外线作战，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，在一至四次反“围剿”战争中，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，就连续取得了胜利，粉碎了敌人的“围剿”，保持并发展了苏区。但现在情势却起了根本的变化，五次反“围剿”，在冒险主义、保守主义的错误指导下，和敌人打硬仗、拚消耗的结果，已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。特别是转移时所表现的逃跑主义，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，五六万军队就带了两三万非战斗人员，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；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，要想打胜仗是很困难

的。

由于不肯承认失败,把希望放在红军大捷上,他们便不肯从事这个适应形势的转变,甚至讥笑这种主张是“悲观失望”。当时,还留下了一个主力二十四师,另有八个独立团。按正确的做法,这份力量应该立即化整为零,分散到苏区几十个县去,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,这样当可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。但他们主张把这些部队全部集中起来训练,准备打大仗。他们说:“我们主力一个师,再加上七个团,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。”而且还打算搞军事学校,搞兵工厂,搞正规军团……总之,还是迷恋着旧的形式,企图用旧的一套再搞起大苏区,来“旧梦重温”。但他们忘记了,正是这种死打硬拚的战术才把一个大苏区搞垮了的。当红军主力在的时候尚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,而不得不撤出,这十几个团又怎能拚得过?而且,部队在苏区失败之后,战斗力、战斗意志已不比从前了。记得主力撤出后不久,广东军阀部队一个营把粤都南部的一个口子占领了,我们要去夺回来。去了八个团近一万人去打,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下来。

这时,实行转变,不仅是必要的,而且也是可能的。主力撤出之后,在历次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的国民党军队,并没有敢贸然进入苏区,他们对红军的转移作了种种的判断,耽心这是一个圈套,只好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。直到1935年的2月,苏区才完全沦于敌手。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2月,这五个多月的时间,正是形势转折的一个过渡时期。如果当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,不是追求旧形势的再现,而是立即实行转变,是可以转过来的。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七年的苏区人民,是十分顽强的,还有各县区的党政机关,和近万人的军队,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,这几十个县,每个县都有二三百人,那么,在三年游击战争中,就可以保存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革命武装;这几十支游击队的活动,就可以保持更多的游击根据地,牵制更多的敌人,给局势以更有力的影响。但是,由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的影响,却转变得迟了。

当然,也并不是所有的苏区都转变迟了。象闽西苏区,那里早

已是敌后,有了一些游击斗争的经验,在邓子恢、张鼎丞、谭震林等同志的领导下,及早地转入了游击战争。湘赣、湘鄂赣、赣东北、鄂豫皖等苏区,虽然也遭受了一些挫折,但也大都先后完成了这个转变。

(二)

到了11月底,敌人已经探明了主力红军的动向,开始向苏区的中心推进。我们在错误指导下,几个战斗都没有得手,再坚持下去是不行了,受错误路线影响的同志这时才同意实行这个转变。当时,曾拟制了一个指示,在这个指示里,说明了从正规到游击、从集中到分散的必要性,要求各地改变旧有的大摊子作风,分散成小组,打埋伏;这样避敌锐气,渡过这个大的风暴,保存力量。在政治上要击破敌人初入苏区时所搞的政治阴谋,夺取敌人搞的“自首大队”的领导权,保护群众,避免无谓的损失。但是,已经来不及了,许多地方已经垮了,电台也叫不通,这个精神没有传达下去。最后只有距离较近的瑞金县委接到了这个指示,钟得胜等同志按照这个精神作了应变的准备,坚持了下来,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游击队。

这时我们便着手收拾中央苏区的摊子。要隐蔽苏区的资财,要动员群众疏散,要安排伤员,分散部队……。中央苏区是一个国家,物资很多,长征部队去的时候尽量带了一些,但留下的还是不少,如书籍、机器、医药器材,还有苏区最宝贵的财产钨砂,都要掩埋起来。

尤其难以处理的是伤员。在历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负伤住院的有一万多伤员,一些轻伤的随队去了,重伤的还有两千多人。看来不改变办法是埋伏不下去了,当时因为我也是伤员,便指定我去动员他们疏散。没有别的办法,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。我对他们说:“江西根据地是失败了,但革命不会失败。革命的火种不断,革命的高潮一定会来。现在是险恶的时候,同志们回家或者到

老百姓家去，种田也好，打游击也好，等革命发展了再回来。但是同志们千万珍重，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。万一遇到敌人，牺牲只能牺牲一个，不要叛变，不要拉拉扯扯。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，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！”讲这番话的心情是沉重的。但伤员们都静静的听着。有的喊：“只要告诉我们就行！”有的说：“只要革命有希望，我们就安心了！”至今，每当忆及这一情景，还仿佛听到这种喊声。只有最坚强的战士，在面临如此严重危险的时候，才有这种英雄的气概。

我们和地方党的同志，把这些伤员交给了当地的群众。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，做儿子也好，做女婿也好，他们伤好了，多一个劳动力，也多一个报仇的人！”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关的。于是又是一个动人的场面：老大爷、老大娘，你驮一个，我抬一个，半天的功夫，两三千伤员全被抬走了。

这些疏散工作就绪之后，敌人已经深入到了苏区的腹部，我们被迫撤到了山上。这时候四面是敌人，到处是枪声，这里喊捉，那里喊杀，老百姓满坑满谷，东边枪响往西跑，西边枪响往东拥，一片国破家亡的景象。到了这时，才更深刻地体验到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全部后果。

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特别大，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，便决定突围。部队十几个团，分成五路向外突。但是，因为行动迟了，敌人已经形成了坚固的包围圈，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，没有独立活动的 ability，结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，大都失败了。

项英、贺昌同志和我是最后突围的。往那里突呢？曾经有过分析：第一条路是往东，到福建去，那里是老苏区，且距漳州、香港较近，便于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，但高山大岭，又逢雨季，敌人封锁太严。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，那里距离较近，两天两夜可以赶到，但那里是沿海地区，公路网、电话网交织，敌人交通便利，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，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，站不住脚。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，这里地跨两省，地形很好，过去毛主席就在这里建立过

最初的红色根据地，估计还有游击队，但要过赣江，敌人控制得很严，过不去。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，到粤赣边界去，这里敌人虽强，我群众基础也强，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。二十二军进入中央苏区之后，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斗争。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。

突围的日期是2月10日。动身之前，我们和中央通了一次电报。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苏区的情况和突围的决定。接到了中央的回电，谈到了遵义会议的情况，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中央的领导。关于中央苏区的斗争，中央指示：要根据情况处理，主要是游击战争。这是最后一次与中央通报，此后电报机破坏了，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，我们便与中央断了联系。

中央的来电，遵义会议的召开，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立，对于我们这些深受“左”倾机会主义之害的人来说，是一个莫大的鼓舞。但是，我们的突围却是很不顺利的。在过乐昌河时，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牺牲了。继续突围中，我们一个不足数的营也被打散了，最后只剩我和项英同志等几个人，几经辗转，化装到了粤赣边境的油山。

至此，我们总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，转入了游击战争。但是，这个转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。象瞿秋白、何叔衡、贺昌、阮啸仙、刘伯坚、李天柱等很多党的优秀的干部，在这大变动中牺牲了，上万人的部队垮了，整个中央苏区连最后一个村庄也落于敌手。这是“左”倾机会主义的恶果，是沉痛的教训。

(三)

油山，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大山。粤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，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山为中心进行的。这里原有党的粤赣特委，由李乐天、杨尚奎、刘建华等同志带领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部队在这里坚持。此外，在上犹、崇义地区，蔡会文、陈丕显同志带领三百余人在活动，钟得胜同志带有二百余人在汀(州)瑞(金)一带活动。

至此，整个轰轰烈烈的中央苏区就剩下了这几块山头，上万的军队，就剩下了这一千多人。

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了。

这时，敌人已经完全占领了苏区，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。但是，就连敌人也知道，这并不是他们的胜利。他们懂得红军的主力向西走了，革命之火会随着长征部队的行动而蔓延开来；他们也懂得，留在苏区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，但火种不灭，终必燎原。因此，蒋介石亲自出马，指挥消灭长征的部队；又指令一部分正规部队会同各省的军阀、地主武装，全力消灭战斗在南方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。

敌人对付游击队的手段是最残酷、最疯狂、最无人性的。

他们知道游击队的生存条件是依靠群众，因此，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。具体的办法，除了疯狂地屠杀镇压群众之外，对游击队便是封山、封坑。他们把山区和邻近山区的村子里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山外去，突行并村，用密集的石堡把山封锁起来。然后在群众中实行保甲制，搞连坐法，并利用地主民团加强乡村的统治，经常点名、检查。检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，有时天天查，一天查几次，有时几天不查，突然袭击一下。在经济上，对于主要的生活用品，如粮食、盐等，实行定量分配，以断绝游击队的物质供应。

这样还怕控制不住，对挨近山区的村子，便派人化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的伤兵，半夜拍门“我是分散的游击队，讲讲阶级友爱，弄点饭给吃吧！”老百姓答了话，立即抓起来，以此挑拨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。

此外，还有搞种种欺骗宣传，在我们内部组织叛变等政治手段。

这样，在遮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之后，在军事上便是大规模喊叫，频繁的搜山。几路队伍，带上猎犬，围攻山区，到处打枪，到处喊叫，后来甚至连探照灯也搬到山里来了。

搜山搜不到我们，便将山林倒上洋油，纵火烧山，烧得野猪、山

牛满山吼叫，长蛇到处乱窜。这样还找不到我们，便化装成老百姓，找个地主婆娘弄个饭篮子带着走前头，满山喊：“游击队同志，反动派去了，给你们送饭来了。”或者装成砍柴的、打猎的、种香菇的、烧炭的来欺骗我们。要不就派人到高山上去瞭望，看那里有我们烧饭的烟；或是派人躲在山林草丛里，听有没有我们的动静；派人到小道上，看草，看山石，有没有我们的足迹……，一发现痕迹，立即就追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游击队几乎失去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条件。

房子是没有的。开始还能搭茅棚子，很简单，弄点树枝茅草，就搭起来。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用竹子搭，把竹子破成两半、在棚顶上排起来，象琉璃瓦。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，不能住了，就用雨伞。下雨天，大树底下把伞一支，背靠背便睡起来。天晴，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，卧看星星月亮，与天地同归了。大庾岭上的雨季十分讨厌，于是又想出了新办法：弄几块雨布，四只角上钉上绊子，往树上一挂，便可遮露挡雨，搬起来也方便，把雨布一解，地上扫扫，每班都有杓子，泼上点水，把痕迹灭掉。

在敌人“清剿”紧张的时候，断粮是常有的事，这时就来上个“靠山的吃山”，吃竹笋、吃野菜、吃杨梅、吃各种野水果。有时还可以打野猪，打山鸡，或是干脆抓蛇吃，好在山是大山，只要胃口好，吃的东西总不愁的。比方马蜂的蛹，就是一种美味。大树棵里，大蜂多得很。搞个竹篾背斗护着头脸，把蜂窝一烧，马蜂飞去了，然后将幼虫搞下，把来一炒，跟蚕蛹一样香脆。做汤吃，白的象牛奶。夏天，山里的田鸡很肥，晚上弄个松光，一照一大堆，又可以对付几天了。

情况比较好的时候，有群众给送来米粮，也可以煮点饭吃，不过部队流动性大，煮饭的傢具就要事先筹备，有机会搞些小锅子来，在野草丛中东丢一只，西丢一只，用时就去找。或者干脆将米和水装到鲜竹筒子里，丢到火里烧。此外，山上也不能完全断人，春天有造纸的来，冬天有烧炭的来，他们是反动派特许进山的，带得有配给的粮食，请他们匀出一点来，可以略作补助。所以，完全

挨饿的时候也并不多。三年的时间，我真正吃不上一点东西的时间只有三天，那是与敌人猝然遭遇，被打散了，带的一小包盐，一天吃完了，只能爬到水沟里喝点水，嚼点野草，第三天便遇到了自己的同志。

走路也不能不非常诡密。不能走路，只能拣没有路的地方走；不能讲话，不能咳嗽，更不能留下脚印。为了消灭形迹，走过之后要把踩倒的草扶起来。落雨天走路，走走又退回来，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，而且不能失落任何东西，否则东西顺流而下，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。

(四)

斗争是艰苦而残酷的。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，一个正确的方针和统一的意志、巩固的团结具有头等的意义。

正确的方针是以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为依据的。当时对政治局势的基本认识是：红军撤走，敌人进占苏区，这是一个大失败，是革命的低潮，是一次退却。但是革命是有希望的。希望在那里？回答不尽相同。有人认为：“主力红军会派队伍回来。”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。主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，无暇顾及我们；即使站住了脚，也要发展新的根据地。这种情势下，我们南方是在援助主力；而主力的胜利和成功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。但要直接派队伍回来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：“是不是再由小到大，搞个大苏区？”这也不可能，形势有了新的发展，已经不是1927年了。

我们所说的希望就在于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。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，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，一定要进攻华北，一定要进攻全中国。一个全面的民族战斗或早或迟，是一定要到来的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的，而是日益加深了。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。抗日战争爆发，革命又会走向新的高潮。

基于这种政治估计，敌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，就不可能是进

攻的，而是退却的。退下来，转变过来，保存革命力量，长期坚持，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，牵制一部分敌人，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，给时局以若干影响，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。这样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，那时，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，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队伍。那时，只有我们共产党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和北方的主力红军夹击，打垮日本帝国主义。事后看来，这一分析是正确的。基于这种分析，当时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乐观的。记得我们曾经对同志们讲过：“有那么一天，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。”

这是对形势的基本认识，是说明问题的出发点。由这一点出发，便可以说服同志们忍耐艰苦、坚持斗争；由这一点出发，便确定了：长期坚持，保存自己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的方针。

当然，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战治分析和论点，也不是每个同志都认识了的，因此，贯彻这一方针就不能不充满着斗争。

这时，一部分同志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，主张拚。他们认为：“苏区失败了，我们躲在这里打埋伏是可耻的。”拚掉几个算几个。这种主张形式上很“左”，实际是右的，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。他们不懂得，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，但这是革命的“血本”，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的种子。保存下一个战士，将来局面开展了，可以当连长、营长；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，将来可以搞一个省委，怎么能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？其实，这样做正符合了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：他们最希望你来拚，拚掉一个少一个。

另一种人则是神经衰弱，被暂时强大的敌人吓倒了。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，而悲观失望，丧失了信心。他们借口怕暴露，而主张消极的打埋伏，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，不露面，不做工作，不进行战斗，坐等新形势的到来。由于斗志消失，慢慢地就走上了土匪主义的道路，搞点吃的，搞点钱，丧失了共产党的政治面目，变成了土匪。或者动摇逃跑，叛变革命。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，是政治上脆弱的表现。他们不了解，我们到这里来打埋伏，不是为了逃

命，不是消极的保存，而是为了发展。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，就必须发展，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，响亮的斗争口号，插一杆红旗在山上，才能动员广大群众，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，贡献自己的力量，给形势以影响，推进革命高潮；任何悲观消极，不但不能保存，而且会导致灭亡。

为了使正确的方针得以贯彻，就要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：反对盲动，反对悲观消极。正确地分析形势，不断地阐明我们的方针，天天讲，大会小会都讲，成了当时政治工作的中心的内容。

经过这一番工作，绝大部分的同志接受了这个方针。他们相信党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，积极地投入了游击斗争，在这残酷的斗争中，我们茹苦含辛，流血牺牲，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。他们是阶级的硬骨头。但是，也总有那么一小部份人，他们是随着土地革命的高潮卷进来的，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动摇了，随潮而退。有的不辞而别了，有的留帖告别了，有的干脆叛变了。

当时，对于如何巩固部队内部的问题上，也有两种方式。一种是强制的，有的表现不好，讲些怪话，便开斗争会；对动摇逃跑的，采取极端的手段镇压。夜间放哨，怕一个人靠不住，便放两个三个。

显然，这种方式是极端错误的。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、疑忌，破坏了团结。有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方式而垮了的。当然，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应当坚决予以镇压。但对队伍内部，主要是强调民主，强调自愿，强调说服。革命是自愿的，决不强迫。对于那些思想动摇的人，应该用说服的办法，劝说他留下来坚持；能坚持当然好，经过这段考验和锻炼，将来在新的革命斗争中是骨干。但如果他一定要走，就让他走，甚至帮助他走。发给路费，帮他换好便衣，找好路线，让他安全地到达家中，甚至他路上被反动派抓住，还要组织黄色村庄的人去保他出来。这样公开的处理动摇问题，做到仁至义尽。这种政策很好，公开了之后，有的本来动摇得要命，也坦白出来不走了；有的走出去，也不会翻脸为仇，危害革命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做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认识，巩固

了团结。

民主，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重要准则。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，越要充分的发扬民主。游击队严格地保持着红军的传统，坚持官兵平等，实行经济民主，打土豪得来的钱大家分着背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，定期公布账目，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，人人都对集体负责。

还有重要的一条，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。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那时钱很少，但大家一样忍受艰苦，吃草根，打赤脚，上上下下谁也不特殊。这样，保持党的作风，表现在日常生活上，不让党的政治面目受到损害，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。自然，最重要的还是正确地阐明局势，进行正面积极的政治教育。有人说打游击没法做政治工作，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谬论。要做，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。只要条件许可，我们就搞起各种学习，讲游击战术，讲军事，讲苏维埃运动的总结，学文化。那时从外面搞到一些书报和小册子，便拚命地学，这也是为将来局面开展进行的必要的准备。甚至分析形势更是随时地进行，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，讲抗日战争的必然到来，讲我们坚持斗争的意义和前途。使全体人员的意志在对客观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牢固地统一起来。这里必须注意的是，由于处境的艰苦、险恶，在指明前途的时候，特别要强调目前的困难。只有对目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，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。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，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，才能战胜这些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。

(五)

坚持敌后游击战争，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，它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、统一的意志，还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、鲜明准确的政治口号和灵活的游击战术。

敌人对各游击区的进攻是疯狂的，但敌人内部的矛盾却暴露

得更清楚了。这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进占了华北，抗日战争势在必发。1936年夏，又爆发了“两广事变”，这个事变虽然以两广军阀投靠蒋介石而结束，但蒋桂、蒋粤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。此外当地土豪与军阀之间、土豪与土豪之间，都存在着矛盾。领导上就要正确地分析掌握这些矛盾，利用这些矛盾，根据这些矛盾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。

当时的主张是：对于重大的政策事件，游击队一定要以党的名义，表示态度，发表宣言，及时提出斗争口号。象“两广事变”，即发表了“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”，华北自治事件，就发表“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”、“告士兵书”等。并派队伍出去，到很远的地方去展开宣传活动。

在那样的条件下，发传单并不是件容易事。没有印刷条件，只能用笔抄写十几份，还要派交通员冒很大的危险跑到公路口、桥梁、乡镇去张贴。影响呢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敌人引进山来了。这种活动当即遭到了右倾主义者的非难。他们借口避免暴露、反对提任何政治口号。他们说：“有什么影响？自找麻烦！”

我们回答这种讥笑说：“现在是有点麻烦，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。麻烦点不要紧，多走几步就是了。”

事实如此，鲜明而又及时的政治口号，震惊了敌人，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传单，印在了人民的心里，指导和鼓舞了他们的斗争。群众说：“国民党天天说游击队垮了，其实人家还在，共产党还在。”

游击斗争必须和群众斗争、和地下党的活动结合、把公开、半公开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。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游击队与群众秘密联系，组织群众的合法斗争，在城镇建立白区工作，进行国民党士兵的工作，甚至在南雄、大庾城里也建立起秘密工作机关。在实际斗争中，游击队摸索到了一种进行合法、半合法斗争的方式，便是搞“黄色村庄”。

在游击斗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，是赤白尖锐对立的局面——山上和靠近山区的村庄，凡游击队力量所及之处，搞起赤色区域，

和反动派控制的白色区域对立。对白区的国民党政权人员和土豪劣绅，不加区别，一律镇压，并且不断扩大赤色区域。在当时条件下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游击斗争是长期的，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，搞一次赤色村庄，群众就受一次摧残。结果游击队成了祸害之源，成了“火神”（游击队一来，敌人就烧房子、杀人），这是不能长期巩固与人民的团结的。于是便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，结合军事压力，搞革命的两面派，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，应付敌人，搞“白皮红心”。这样，既保护了群众，又保证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，并且可以通过黄色村庄与比较进步的地主、开明士绅及其知识分子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，推动抗日工作。

这个策略很重要。但是在搞这种两面派时，除了警惕争取对象可能“反水”之外，在内部还必须同另一种倾向作斗争，那便是单纯做地下工作，下山去到“黄色村庄”搞半公开斗争，而忽视坚持武装的重要性。因为斗争实在是太艰苦了，以我为例，在三年中我只两次进了房子，四次看到了老百姓。这长期的山林生活，餐风饮露，忍饥耐寒，有的人厌倦了，现在有了“黄色村庄”的条件，便插枪，到村镇里去。这是很危险的。因为这就削弱以至取消了武装力量。经验证明，游击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，政治旗帜必须坚持。党的武装，这是敌后游击斗争的主要方面，是我们的本钱。抗日高潮毕竟是要到来的。共产党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的地位，取决于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弱、武装的多少；只有有了枪杆子，我们才有发言权。

打游击，必须要有一套的游击战术。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游击战争中，创造了系统的宝贵的经验。这些经验，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继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。

毛主席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，“叫化子打狗靠面墙”，进行游击战争，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。粤赣边的游击斗争，一开始便是以油山地区为根据地，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。在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前提下，还要有一套灵活的战术。首先，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，是有政治任务的。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、又

不是消极埋伏,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:不常打,也不是长期不打。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,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,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,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。

既然是打这样的仗,就有这种仗的打法。游击队人少、枪弹少、打硬仗是蚀本的。因此伏击、袭击便是作战的主要形式。游击队三五个人、十来个人,分散活动,和人民结合,把情报、时间、地点搞清楚、弄准确,出其不意,隐蔽接敌,枪一响,几分钟就解决战斗,解决了就走。或者远途奔袭,一夜急行几十里、百把里,插到敌后去,来一个“摸冬瓜”,一下子把敌人的区公所、乡公所搞掉,土豪抓来。这样的战斗,再加上发传单,写标语,地下党的策应,代价小,收获多,影响大,造成对敌人的威胁。

当然,也不可能每次战斗都能取得主动,在奔袭战斗或者在敌人“围剿”中跳圈子的时候,也有时和敌人遭遇,或者遭到敌人的袭击。这是最讨厌的情况。因为不成对手,一打就只好分散隐蔽。这时,最要紧的是沉着。好在山深林密,你躲起来,只要敌人看不见你就别动。敌人是很狡猾的,看看搜不到,骂一声:“哼,土匪都跑了,集合,回去!”哨子一吹,故意弄得人马杂乱,其实一个连走了不过一个排,三分之二留下来了。但我们是打埋伏的老祖宗,懂得他这一套,就给他个不出来。两个钟头以后,倒是敌人沉不住气了,当官的一跳出来,又是一阵咒骂:“嗨,土匪真沉着。告诉你这次真走了。”又是吹哨子,集合,喊口令,叮叮当当,看样子真走了,但走过不一会,一个回马枪,又包围上来了。我们还是一样,树不摇,草不动。当官的这次更火了,跳着脚骂:“好,有你的!你有本事出来干!”于是机关枪、迫击炮往山里胡打一气,一边打一边乱叫:“看,那里一个,大石头底下。出来,出来,看见你了。”再不弄个人假充游击队员:“别打了,我讲:那边还有几个同志……”有时我们的人也会在这乱枪中受伤,但不管伤多重,都忍住不哼。敌人胡搞一气,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就凭着这套办法,游击队才能做到打得对,打得巧,杀伤了敌人,保存了自己。